



花瑶文化
研究丛书

米莉 黄勇军 主编



瑶山上的中国：

花瑶民族的生存境遇考察

黄勇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花瑶文化
研究丛书

米莉 黄勇军 主编

瑶山上的中国：

花瑶民族的生存境遇考察

黄勇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瑶山上的中国:花瑶民族的生存境遇考察/黄勇军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 - 7 - 5161 - 1745 - 3

I. ①瑶… II. ①黄… III. ①瑶族—民族社会学—研究—中国
IV. ①K285.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71554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郭沂纹
责任编辑 丁玉灵
责任校对 林福国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
插 页 2
字 数 266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献 给 花 瑶

目 录

导论	(1)
一 缘起	(1)
二 研究立场与治学态度	(6)
三 历史与“创造”历史	(8)
四 传统与“创造”传统	(11)
五 遗忘与“再度”遗忘	(13)
六 “我”的双重身份	(15)
第一章 历史、地理与传说：大瑶山的生存状况考察	(18)
一 化外之民：位处悬绝之地的大瑶山	(20)
二 追寻先民的踪迹：梅山蛮的历史与白马山的传说	(35)
三 日益狭小的生存空间：历代行政区划中的大瑶山	(49)
四 祖坟之地：现代土地归属权争议中的大瑶山	(63)
五 “麻坑”之地：土地归属权争议中的瑶汉关系	(75)
第二章 迁徙者的境遇：称谓变迁中的族群心理考察	(95)
一 迁徙者的称谓：花瑶族群心理的集中体现	(98)
二 “花瑶”：迁徙者的族群归属及其困惑	(112)
三 挑花裙：花瑶民族生存状况的一个镜像	(124)
四 政府之热与民众之冷：旅游开发中花瑶服饰面临的新困境	(130)

第三章 汉化、瑶化与山地化：文明冲突中的大瑶山	(140)
一 汉化与谋反：清王朝满汉关系的启示	(143)
二 “抵抗”与“归顺”：花瑶民族对待汉化问题的历史 分界点	(151)
三 族谱、辈分诗、神龛、巫术：汉化进程中的几个 典型个案	(166)
四 “瑶化”与“山地化”：大瑶山上的汉族人	(182)
第四章 婚育与礼俗：花瑶民族的心理基点与文化主线	(202)
一 种族繁衍：对抗自然的艰辛历程	(204)
二 人口与族群：计划生育背景下的生存困境	(210)
三 婚姻与生育：花瑶文化的主要载体	(223)
四 变动秩序中的花瑶传统：“飙车党”与《关于规范瑶族 风俗礼仪的有关问题座谈会议纪要》	(237)
参考书目	(256)
后记	(262)

导 论

从来不曾觉得大瑶山与中国有什么关系，当然，大瑶山属于中国，这是没有问题的，尽管只是其中很小很小的一个小角落。不过，自小生存于这样一个很小很小的小角落里的自己，在很长的时间里，从心底里觉得自己生存着的这片土地只不过是一个可以被遗忘的、从不重要的、属于中国无数山区中的一个毫无特色可言的山区而已。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对于如此庞大、复杂、多样的“中国”而言，似乎毫无关系。

然而，就是这种看似毫无关系的状况，使得长久以来位处“悬绝之地”的大瑶山，以及身为“化外之民”的花瑶，却成为了研究“中国”的一个典型样本与经典个案。

一 缘起

自己出生于这个属于“中国”之中，却毫无特色可言的、只是一个小角落的大瑶山之中的、一个更是小得不能再小的、且更无特色可言的小小角落里。然后，在这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山村中，玩了六年泥巴；然后，被父亲带去大一点的、四面被山环绕的、位于大瑶山之中的小镇读小学，又是六年，还由于不习惯从玩泥巴的放纵忽然转变为背着手听课的枯燥，不顾父亲的责罚逃了半年课、读了半年学前班，耽搁了一年；然后，考入更大一点的、距离小县城十里地之外的省立重点中学，又是六年；再然后，似乎获得了命运女神的眷顾一般，通过高考，从这个只是大了一点的小县城的郊区地带，去往全中国最大的地方——

京师——旁边几十公里之外的属自古充军之地的昌平，读大学，又是四年；最终，通过考研的方式，千辛万苦地进入了京师之城，在学院路，由硕士而博士，又待了六年。如此一路辛苦地走来，更是觉得对于如此庞大、复杂、多样、资源稀缺、竞争激烈、且高度集中的“中国”而言，大瑶山无论从哪个角度上，都是无足轻重，也无足挂齿的。因此，在自我生命的前23年里，从未觉得自己曾经生存过的这片土地值得自己去关注、了解与记述。对于一个一直在求学，一直在上进，一直在突破，一直在试图走出大山、走进“中国”甚至“国际”视野之中的年轻人而言，对自己曾经生存过的大瑶山与现在正生存于其中的“中国”之间的关系，有着如下极为明确的概念：大瑶山无疑属于中国，但却又与“中国”毫无瓜葛，作为可以被外界所遗忘的一个小角落，无论这里发生过或正在发生什么，都仅仅是大瑶山自身的事情，而远不是也不可能是“中国”的事情。

2003年，“非典”（又称“SARS”）从天而降，自己也平生第一次“从天而降”，与夫人坐飞机逃难般飞回长沙，观察数日，再辗转回到了大瑶山。从恐慌的京师之地，重回宁静的大瑶山故乡的怀抱，感受着大自然的气息，内心之中，犹如脱胎换骨一般，对人生、自然与宇宙有了全新的认知与感悟。后来又与几位儿时伙伴，去往大托大峡谷游玩，本来以为只是一次普通的爬山经历，却不曾想最终转化成为一次有惊无险、万分艰难的探险之旅，让自己对大瑶山的山水重新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与浓厚的兴趣。此后，参加了花瑶人的“讨僚皈”活动，进一步感受到了花瑶地区所发生的前所未有的新变迁，尤为惊异地发现，曾经是大瑶山中最为贫困的村落之一的崇木凼村，居然无视村外连接乡与乡之间的大马路依然是泥石路的情况下，独自修了一条几里地长的水泥路。事实上，直到三年后，村寨外面的那条乡与乡之间的大马路才硬化成了水泥路。可见，一个曾经如此贫穷的花瑶村寨之中，单独修了这样一条水泥路，这在大瑶山的历史上，大概是破天荒的事情。沿着这条水泥路进入曾经去过数次的崇木凼村，发现沿着那几片古树林，修了一条水泥、石板路面的步行道。带着满心的疑惑，与当地的花瑶老乡聊天，方

才了解到，时任邵阳市市委书记的蒋建国，自2002年起，将这里当成了自己的扶贫开发工作联系村，这一举动也彻底改变了这个种粮“三年两不收”的穷乡僻壤的面貌与命运。多年后的《隆回县志》对此有如下描述：蒋书记“先后8次来到瑶山村寨访民情、送温暖，足迹踏遍瑶家村寨，扶持种植中药材、开发旅游业，被群众称为‘瑶山人民的贴心人，脱贫致富的领路人’”^①。

此时，自己敏感地意识到，曾经被人所遗忘的大瑶山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中。这一直觉无疑获得了此后近十年中，花瑶地区旅游、经济、文化等事业的迅猛发展的验证与支撑，只是未曾意识到的是，自己居然也会在这一时代大变革之中拥有一席之地。

许是机缘巧合，许是命运眷念，总之，在结束因“非典”而来的长达四个月的假期，准备回京之际，我的姐夫、原湖南省毅鹏金银花保健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罗忠毅，约我们到他设置在隆回县城的公司总部小住几日，以便能够为其事业出谋划策一番，我们也应邀前往。其时，作为大瑶山农产品开发领头羊^②的罗总，与时任隆回县县长的钟义凡已经很熟悉，故约了钟县长来公司的毅鹏茶庄喝茶、聊天。钟县长是湖南省首批“双高”人才选拔出来的地方官员，有着明显的学者气质，初到隆回的他对隆回县所具有的极为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我们当时主要围绕着隆回县的三大文化：花瑶文化、魏源文化、滩头年画，及与此相关的研究、保护、开发与利用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对话与交流。连续四五个晚上，都是从十点钟左右，他结束一天的工作与应酬来到茶庄开始，我

^① 杨第美等主编：《隆回县志》，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第397页。

^② 毅鹏公司曾经是隆回县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尤其是从大瑶山走出来的极为难得的品牌公司。关于毅鹏公司，2006年版《隆回县志》中也有所记述，我们能够从彩页的第12页上看到毅鹏公司原厂房大门的图片、第16页上能够看到毅鹏公司所生产的金银花茶茶的图片，在正文第181页，可以看到“毅鹏金银花茶商标”的图标，以及这样的记述：“（2002年）毅鹏公司的‘毅鹏’（茶叶），获湖南省著名商标。”此外，还能在第343页看到如下描述：“隆回县毅鹏公司在县城设有营销总部，全国设立近100个网点，年销售额2000多万元以上。”（参见杨第美等主编《隆回县志》，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然而，后来由于经营不善，且遭遇金融危机，资金链断裂，不得不于2010年破产重组。现在，毅鹏公司的系列产品还在县城范围内销售，公司举步维艰。

们就一直喝茶、聊天，每次都会延续到半夜两三点钟，而且每次都是我主动以他第二天还要工作、需要早点休息为由，结束对话。事实上，当时的我对滩头年画并不了解，但是，对本就属于儒家思想范畴的魏源文化，则已经有所了解与体悟，至于花瑶文化，本就是自己从小熟知的文化。因此，在聊天的过程中，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与创见。现在想来，当时的一县之长能够与年仅24岁、尚为硕士研究生的自己之间，有如此长时间的对话与沟通，也实属不易了。

在此过程中，我看到了钟县长对于隆回文化、旅游、经济等未来发展的全新的思路与干劲，而钟县长则看中了我的年轻气盛、小有才气，尤其是作为家乡人对家乡事业的那份热情与赤忱。最终，我们在这样一种聊天的氛围中，初步达成了合作的意向。回京后，我与自己的导师、时任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的杨阳教授商议，在我的鼓动下，他也去了趟大瑶山进行考察，并最终促成了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与湖南省隆回县县政府之间的合作，签署了“湖南省隆回县花瑶文化研究”项目协议。此后，根据协议的内容，我领着中国政法大学“花瑶文化”考察团成员，^①在2004年7月底至10月底这三个月的时间里，实地考察了居住于大瑶山之内的古老而神秘的少数民族分支——“花瑶”，感受到了花瑶人的古朴与真情，见识了花瑶文化的独特与价值，收集到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与文献资料，^②并最终

^① 中国政法大学“花瑶文化”考察团不仅成功地完成了调查任务，而且还与花瑶同胞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主要是：黄勇军、米莉、李严昌、杜联合、李筠、余金刚、彭润金、黄修裕、彭晔，以及回楚佳、廖耀华和谭克松（后三位是隆回县县政府为我们配备的协助调查人员）。

^② 在2004年的实地调研阶段，我们不仅得到了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杨阳教授与林存光教授的精心指导，而且得到了隆回县委书记钟义凡、副县长罗海波、文化局张晗局长、阳志先副局长和其他工作人员以及县政府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如：档案局、统计局、民宗局、旅游局等）、小沙江、虎形山、麻塘山三个乡镇工作人员的大力配合与协作。在此过程中，花瑶同胞对我们的信任以及对事关自身文化传统的调研事业的鼎力支持，也是我们的考察能够得以层层深入的决定性因素。其中，小沙江镇旺溪村回家湾、江边村麻坑，虎形山乡水洞坪村、崇木凶村等地的瑶族同胞们给予我们的帮助，以及提供给我们的资料都令我们受益匪浅。此外，黄勇军的家人也在实地调研期间给我们提供了考察所需的各种方便。

完成了近百万字的研究成果的写作与编撰。2005 年底，在隆回县召开的结项会议上，成功获得结项。但是，由于各种非学术的因素，使得这套花瑶文化研究成果一直未能公开出版，如此又过了多年。

在这些年中，自己可谓马不停蹄地完成了人生中的一系列大事件，诸如拿到博士学位、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做访问学者、在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觅得一份差事、结婚、安家、生女、任硕士生导师等，并于 2010 年出版了个人的首部专著：《儒家政治思维传统及其现代转化》^①，且于 2011 年以“儒家政治合法性理论研究”为题拿到了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在此过程中，关于花瑶文化研究的成果是否公开出版，并不是自己学术研究的重中之重。

同样，在这些年中，花瑶与大瑶山地区的开发与发展，也是马不停蹄。这也使得大瑶山对于“中国”而言所具备的价值与意义，远远超越了学术研究的层面，进一步涉及了诸如文化、旅游、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这片曾经不为人所知的土地，在近年来，却忽然之间成为了中国的一片新的“热土”。对于此，我们从这片土地近年来所获得的如下荣誉与称号之中，就能够看出此处所谓“瑶山上的中国”在现实生活中所具备的非凡的价值与意义：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名县：隆回（2011）；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花瑶景区（2009）；中国最佳旅游资源城市：隆回（2009）；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瑶呜哇山歌（2008）；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瑶挑花（2006）；中国最具魅力乡村：崇木幽（2006）；中国金银花之乡：隆回（2001）。虽然有三处国家级的荣誉被归属于隆回，但是真正支撑这一荣誉的，恰恰都来源于大瑶山与花瑶。

大瑶山能够与“中国”发生如此之多的直接联系，固然让出身大瑶山的我欣喜、雀跃。然而，眼看着自己手头上的这几部凝聚了如此多人的心血的研究成果，却迟迟未能付梓，未能在如此迅猛的变革进程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与价值，也就成为了我心头挥之不去的重负。

^① 黄勇军：《儒家政治思维传统及其现代转化》，岳麓书社 2010 年版。

最终，自己在2011年年底再次下定决心，要将这一研究进行到底。于是，以个人的名义，带了两位优秀的、在学术上很有潜力的本科生：顾旭光、徐海东，一路坐着长途巴士，重回大瑶山，进行为期半个月的学术回访。2012年6月，又与米莉一起带着一岁多的女儿子牧，与同事刘先江、朋友范存等人一起驾车进入大瑶山，再一次进行了为期两天的短暂回访。在此过程中，不仅补充了大量新的第一手资料与文献资料，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切身地感受到了大瑶山近年来所发生的巨变，以及这种巨变背后所隐含着的困境、危机与挑战。这一新的经历，为我们最终完成《花瑶文化研究》丛书系列书稿的写作与定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为重要的是，当我们正在为这套丛书的最终出版所需的经费发愁时，米莉所在的中南大学新上任的校长张尧学院士，以其敏锐的眼光、提携后进的气度，为我们解决了全部的出版资金，彻底消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

至此，这一历时近十年的研究之旅，暂告一段落。

二 研究立场与治学态度

自大学本科从事学术研究以来，自己就一直坚持着现代新儒家所标榜的如下基本立场：同情地理解。^① 此处所谓“同情地理解”，或许与新儒家有所不同，主要是指在展开对花瑶文化的研究中，尽可能地避免某种当下很是流行的“现代人的优越感”以及“外来者的距离感”。

在那些具备“现代人的优越感”的人那里，总是觉得自己所处的时代好于以往任何时代，自己时代的知识与智慧优于任何以往的时代，自己这代人的智商与水准高于任何以往的时代。然而，现代人所持有的

^① 所谓“同情地理解”，本是现代新儒家们如杜维明、刘述先等人提出来的，主要强调在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我们对于中国的传统思想与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与文化，应当抱有“同情地理解”的态度，而不是一味地予以贬低、毁弃，“痛打落水狗”。他们最大的建树就在于，在西学如此强势的现代学术界，通过进入到儒家思想自我的生命意境与思维逻辑之中，重新阐述儒家思想与文化。

于是，学者们对于自己所研究的对象本身所蕴涵着的复杂性、多样性、生命性、鲜活性等问题，要么视而不见、要么刻意回避，以此成就自己内心之中所预设的那种莫名其妙的“现代人的优越感”与“外来者的距离感”，并进而证明自己所处时空范畴的优越性与所使用理论范式的真理性。

这样的研究现状，无疑是本文所希望予以反思与避免的。事实上，在外界看来更为封闭、保守、落后、贫穷的花瑶人，其实有着自己的情性、意趣、洒脱、愉悦；在外界看来更为枯燥、简单、刻板、无趣的大瑶山的生活，其实有着自己的色彩、情趣、空灵、意境。作为现代人与外来者，首先需要做到的，不是偏见与距离，而是立足于“同情地理解”基础上的尊重与融合。

在研究的过程中，除了立足于“同情地理解”之外，还将尽量遵循所谓“多研究些问题”以及“为学术而学术”的治学态度。

在本文看来，关于花瑶的研究，最为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从意识形态或是价值判断的角度入手，对其进行多少定性式的研究与评判。而是应当尽可能地根据自己所看到、所接触到、所感受到的实际状况，再根据纯粹学术研究的需要出发，设定不同的学术主题，发现不同的问题意识，并在每个学术主题与问题意识之下，进行尽可能详尽与深度的研究，无论从历史的纵深，还是从时空的延伸上，都能够进行探讨与研究，力求对每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相互关系、相互影响等，进行尽可能细致而全面的梳理与探析，从而展现出一个或许极为复杂，但更接近于事实本身的场景与场域。

三 历史与“创造”历史

近现代西方提出了极为清晰、明确的所谓“线性发展观”，将人类历史与文明的展开过程，从思辨的角度上设定为一条不断发展、延续的、具备规律性与决定性的时空轨迹，将已有的人类历史与文明，根据各种标准，划定为不同的社会形态与文明形态，并且相信，这些不同的

社会形态与文明形态之间是存在着优劣、好坏、先后等衡量标准的，历史不仅存在着规律性，而且任何人类发展的历史都应当受到这种规律性的检验与评判。因此，某一种被判定为保守、落后、低级的社会形态与文明形态，终将被另一种被判定为发展、先进、高级的社会形态与文明形态所取代。

在这一历史观念中，有着明确的“西方中心观”的价值预设，以西方历史与文明的发展为标准，“中国”这样一种在西方人看来是如此封闭、古老而孤立的国度，无疑成为了西方所设定的人类历史展开逻辑与规律中的真正的牺牲品，“孟德斯鸠、孔多塞、赫尔德、黑格尔接二连三地以中国与欧洲之间一静一动的对比来彰显近代欧洲的正确与伟大”^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思想者们通过对自己的熟悉与自信，反衬出中国的落后与糟糕，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他者”形象，被一再凸显。这种观点被西方尤其是德国的思想家们不断强化，^②并最终影响到中国人自己对于自身历史的观感，进而进入了激进的反传统与反自身历史的历史进程之中。^③西方人就是在这样一种“中西二元对立模式”与“刺激—反应模式”的观念与范式中展开对中国的研究的。在此过程中，于“东”“西”方相互对峙的境遇中处于绝对弱势的中国传统逐渐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与自发性，强势的西方成为了衡量中国传统与问题的无可置疑的标准，而中国传统也在这样的框架下，逐渐被人们当作一个与西方相对的存在物，往往与落后、停滞、黑暗、专制等词汇联系在一起。可以想见，当“中国”都已经成为了这样一个形象的时

① 张国刚、吴莉苇：《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11页。

② [德]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③ 有学者注意到，20世纪初的中国学者们在“重写中国历史”时，非常明显地受到了德国“历史主义”观点的极大影响。德国曾经远远落后于同属欧洲的英国、法国，而且部分领土被法国所占领，极大地刺激了德国思想家进行不同于英法的历史学努力，这无疑与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极其相似。因此，中国学者接受德国学者的观点有其内在的原因。（Xiaoqing Lin: *Historicizing Subjective Reality: Rewriting History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Modern China*, Vol. 25, No. 1. (Jan., 1999), pp. 3-5.）

候，作为中国之中的一个更为传统、更为保守、更为封闭的大瑶山与花瑶，会遭遇到怎样的评判与定性。

当然，现在西方学界也意识到了这一历史定性，及由此产生的以西方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在取得了诸多成就的同时，也造成了诸多问题与麻烦，遭受到了诸多的质疑与批判。^① 现代西方学者正在力图抛弃这种对立思维，转而试图在重回中国历史本身的基础上重构所谓“中国中心观”^②。

西方学界的这一转移对于我们此处的研究而言，有着双重的意义，不仅提醒我们要警惕西方中心观下所形成的诸多定式思维与定性观念，对于我们展开研究时，所可能起到的负面作用与先入性偏见；而且，还能够提醒我们在写作的过程中，实现所谓“花瑶中心观”，或是“大瑶山中心观”，而不是“西方中心观”，也不是“汉族中心观”，甚至不是“中国中心观”！——或者，我们甚至应当更进一步，在后现代思维下，解构所谓“中心观”，因为，人类历史与文明的进程，根本就没有中心、没有延续、没有规律、没有决定论……有的只是一种“断裂、缺陷、缺口、实证性的崭新形式乃至突然的再分配”^③。

当然，使用后现代的范式展开研究，即使我们意识到了，在这里也是极为艰难的。我们所能够做到的，就是尽量正视研究过程中所发现的关于断裂、缺陷、缺口、实证性的问题与困境，并尽量予以回应。这样，我们至少可以退而求其次地实现所谓“花瑶中心观”与“大瑶山中心观”，以花瑶和大瑶山发生、发展的事件，作为我们写作的支撑与依靠，而不是用花瑶与大瑶山之外的世界、观念与评判标准，来评判花瑶与大瑶山所存在着的种种状况。

事实上，花瑶与大瑶山有着属于自己的历史展开方式与展开逻辑，即使一直受到外界力量的干预、渗透与影响，但是，身处一个相对闭塞

① 黄勇军：《儒家政治思维传统及其现代转化》，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8—11页。

② [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2002年版。

③ [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88页。

的地理空间之中的人们，并不会认为外来力量的存在会是长时间的，他们已经形成了某种抵制外界干预的免疫能力，一方面有限度地接受外来力量的某些方面，另一方面又固守着自己的传统与过往，并最终将外来力量的那些影响逐渐消融、吸纳到自己所熟悉的范畴之内，继续前行。换言之，如果大瑶山之外的中国人，或者大瑶山之中接受了中国近代史演进过程的汉族人，能够明确地感受到诸如 1840 年鸦片战争、1895 年甲午海战、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华、1911 年辛亥革命、1938 年抗日战争、1949 年新中国成立、1958 年“大跃进”、1966 年“文化大革命”、1978 年改革开放等历史事件所体现出来的对于传统的断裂感与陌生感的话，^① 那么，对于大多数的花瑶与大瑶山中的人而言，他们的历史却并不是这样展开的，他们有着自己的记忆与观念。或许，大瑶山上某年所发生的某次地质灾害、人口迁徙、内部纠纷等，会比这些更为宏大视野中的所谓“跨历史”的时代划分方式，更接近花瑶与大瑶山本身的历史展开方式与展开逻辑。

四 传统与“创造”传统

当美国学者列文森在 1960 年代宣称：中国的儒家传统终将进入“博物馆”，不再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影响之时。^② 他无疑敏感地察觉到了儒家文化在中国近现代进程中所遭受内外夹击的尴尬地位，以及被人日渐抛弃且毫无惋惜之情的无助处境。作为一个以现代性衡量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美国学者而言，中国的儒家传统不仅将受到现代性的冲击而日渐解体，而且儒家传统本身在历史上也处在一种困境之中。在列文森的眼中，儒家传统与中国现代化之间，处于一种毫无妥协与调和可能的对立状态之中。

这种强调传统与现代之间所存在的“二元对立”的观点与思维方

^① 杜维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4 页。

^② [美]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